

论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与变革

● 黄海群 林培锦

摘要 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既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又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文章通过回顾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变迁与发展过程,以制度创新理论分析其特征,探讨大学学术评价制度渐进式变革、适当强化诱致性变迁和提供良性制度创新环境等路径。

关键词 制度创新 大学学术 评价制度 变迁变革

作者 黄海群,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龙岩学院副研究员 (福建龙岩 364000)

林培锦,闽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 (福建漳州 363000)

学术评价制度具有导向和规范的作用,其创新与变革在大学学术活动中一直备受关注,尤其在当前学风比较浮躁、学术秩序比较混乱的大背景下,如何更新理念、突破旧的思维框架,进而作出新的符合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制度设计,成为当务之急。“当今学术研究的种种问题根源确实在于学术评价机制不当,对研究发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要建构合理的学术制度首先必须从评价制度入手,才能逐步引导从选题到方法到引证等整个规范的确立。”^[1]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实现学术评价制度的创新?纵观已有的有关学术评价制度研究,大致呈现这三种特征:一是侧重于单项制度评价的研究;二是主要针对量化评价方式的描述与评论;三是以“破”(制度批判)为主,忽视“立”(制度创新)的研究。总体观之,以具体描述性批评的研究较多,鲜有对学术评价制度整体性的学理分析。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研究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创新的问题,追寻深层次机理,以期获得有益的

启发,探索切实的解决之道。

一、制度创新理论的核心

20世纪70年代前后,以科斯(Coase)和诺斯(Douglas C. 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的制度创新理论受到学界的推崇。1971年诺斯在《制度变迁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开创性地阐述了制度创新理论。他认为,制度创新是“用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取代原有制度或对一种更有效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是制度主体解决制度短缺,从而扩大制度供给以获得潜在收益的行为”^[2]。

新制度经济学往往交替使用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两个理论,甚至在现实的运用中,两者往往未有精细的区别。而在诺斯看来,现有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理论假设的,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但是,对制度历史演进的研究表明,完全理性的制度创新理论与现实产生了偏离,必须通过非完全理性选择来研究现实中产生偏离的原因并加以纠正,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因此,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1年度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大学学术同行评议研究:利益冲突的视角”(编号BIA110079)、教育部201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同行专家评议的高校科研经费绩效拨款模式研究”(编号13YJCZH098)的研究成果。

制度变迁理论是对制度创新理论的一种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制度创新理论应该涵盖制度变迁理论。”^[3]

通观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笔者以为,新制度经济学所倡导的制度创新涉及如下三个维度。

第一,动力与原因(“为何要创新以及何时创新”)。新制度经济学派用交易成本和利润来解释,认为制度改革的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是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换言之,当制度创新主体发现通过制度的变更可以获得旧制度无法提供的收益或可以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时,制度创新便会发生。

第二,模式与方法(“谁来创新以及如何创新”)。诺斯认为,制度由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及其实实施特征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它由公共权威机构或有关各方共同制定,具有强制力;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等,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按发起主体在变革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将“制度创新模式分为强制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前者是国家在追求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变迁,后者是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4]。“按创新的来源可分为创设式制度创新和移植式制度创新,前者制度创新的目标制度基本上是依赖自我设计或自我建构制度变迁,后者基本上是根据他方已经创设和动作并具有一定效率的制度变迁。”^[5]

第三,环境与条件(“受到何种约束以及如何修正达到有效结果”)。制度经济学指出,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都要受到制度环境的掣肘和影响,当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时,原有的制度安排会变得非最佳、失效或短缺,此时,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获取原有制度结构中无法得到的利益。

二、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轨迹及特征

从制度创新理论的内涵要义上来看,研究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创新,首先必须对其发展历程(变迁)及特征给予相应的关注。

(一) 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变迁轨迹

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起步模仿阶段(1902-1948)。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学者们所从事的是为君权、皇权专制服务的经学传统的解读,一味盲从或虚应故事地“代圣人立言”是当时的“学术”标准。因此,谈不上有过科学的“学术评价”活动,充其量只存在学者之间的“学术批评”。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的非科学性运行,导致我国学术评价起步的滞后和制度的缺失。直到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颁布,并启动了根据大学教员学历及能力进行评聘的体制,才开始了我国大学学术评价的制度化进程。民

国时期,德国“海归”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倡导“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初步构建了以欧美国家为蓝本,包括教员选聘制、学术研究审查与激励机制等在内的学术评价体系。北京大学的改革开启了中国现代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先河,成为其他各公私立大学仿效的典范。教员聘任制从早年的“伯乐相马”过渡到制度化的规范模式。如,“1920年,在北大校行政会议下设立聘任委员会,协助校长审查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委员以教授为限,规定聘任委员会非校长或其代表出席不得开会,凡新聘或延聘教授都要经过委员会的审查与投票决定。”^[6]再以1926年4月曹云祥担任校长时的清华学堂为例,“教授会召开选举评议会成员的第一次会议,最后当选者为:陈达、孟宪承、戴志骞、杨光弼、吴宓、赵元任、陈福田。从名单的构成看,评议会议事可以保证有较高的学术品味。”^[7]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审查与激励基本是建立在同行评议的基础之上,各审议机构人员均由当时学术界公认的一流专家组成,较好地保证了审查的质量。从程序及其效果看,可反映出当时学术权力的分量、学术评价的质量以及对全国学术评价制度建设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的排斥学术阶段(1949-1977)。中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主导着学术活动和学术评价的走向。单就学术界而言,“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以后至文革前,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达50余次”^[8]。这些“政治运动”和“思想大批判”,不仅严重破坏了学术生态环境,而且对潜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家、学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与打击。如,学术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有关《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此外,还有对胡适、梁漱溟、冯友兰、马寅初、周谷城、杨献珍、孙冶方、尚钺等大学者的学术思想的批判等。另外,“文革”前,在政治挂帅的大学里,尽管存在有关教师职员聘任与晋升以及学术审查与奖励的学术评价活动,但不可避免会打上“政治化”的烙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建立的学部委员制度,作为全国性最高学术活动机构也因社会意识形态禁锢而停止活动的开展。在这种大背景下,学术评价被异化,政治成为学术评价的唯一尺度或标准。“文革”期间,学术评价完全中断,以大批判代替学术活动,学术文化几乎被摧毁。

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建与完善阶段(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学术评价制度进入重建与完善的阶段,相关研究日趋活跃。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关注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学术评价制度从未停止过。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献计量法和期刊引用率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学术评价活动中获得了快速发展。当前,大学的学术评价制

度主要以量化评价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体现。各大学基本都制订了相应的学术规范、学术评审制度、同行评议制度、学术奖励制度等,但具体评价时各有侧重。应该说,制度在百花齐放中日趋完善。但是,从整体上看,量化评价方法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甚至出现了“唯数量化”的显性特征。纵观当前的大学学术活动,无论哪个层面的学术评价,无不以课题的数量、等级、论文发表的刊物等级(如SCI、EI、CSSCI、国内权威、核心期刊等)、论文数量作为标准。有学者甚至借用西方社会学家的用词,称这种量化的学术评价管理为“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9]。在这种量化评价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同行评议不可避免地矮化了,大大削弱了其本该发挥的功效。物极必反,笔者认为当前因量化评价而诱发的学术不端、学术失范现象,预示着新一轮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创新的到来。

(二) 学术评价制度变迁的特征分析

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建设起步滞后。尽管民国时期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借鉴西方国家的模式,初步建立了同行评议式的学术评价制度,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运动和思想大批判浪潮的到来,学术评价制度被异化。直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评价制度才得到重建与完善。因此,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建设其实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这种建设起步滞后的根源除了政治因素,长期以来文化的专制也是重要原因。

制度供给呈现高——低——高的U字形曲线。在上述制度变迁历程中,第一和第三个阶段制度供给较为充足,而第二阶段制度供给不仅明显不足而且糟糕。第一阶段,民国时期无论是教育部还是各大学都建立了相应的大学教员聘任规则、学术审查与激励条例;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时,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文件或政策发布,即使有也是零星的几个规定或条例,最终也因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中途夭折或得不到真正的实施;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国家层面和大学层面都制订了有关学术评价的相关规定。但总体上,制度供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强制性制度变迁始终占上风。以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为主要形式,各个阶段的制度自上而下,以政府文件或法令的形式正式颁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个时期有关学术评价的条例或文件基本是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发布的。二是每个时期的制度改革都是政府占据主动地位,而大学处于被动地位,大学往往是跟着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精神走。诚如康宁所言“研究改革以来高等教育制度转换的特征,始终给人强烈印象的是政府以一个强势主导者的身份引导着改革。”^[10]三是能从核心制度开始推行,执行起来很得力,有别于诱致性变迁的外围式深入方式。

政治和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明显。在制度变迁的发展历程中深受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和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同行评议的引入,的确为当时的大学学术评价输入了新鲜血液,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大批判运动开展的影响,加上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传统,评价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政治化”的方向发展,即使是到了改革开放后,量化评价制度的盛行也是科层制管理模式、行政权力掌控大学和“官本位”思想综合影响下的必然产物。这充分说明,在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平乔维奇(Pejovich Svetozar)眼中的“游戏规则”^[11]——制度环境的因素,尤其是政治及传统文化因素。

三、制度创新与变革的路径探讨

显然,当前学术界产生的不少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至少表明我国的大学学术评价制度或机制是不完善的和片面的。“片面的(学术)价值评价机制是学术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诱因。”^[12]因此,制度的创新与变革变得十分紧迫。那么,如何实现制度的创新呢?一方面,随着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大学及大学的学术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大学者对现行学术评价制度的批评与研究以及我国近30年来的学术评价实践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另一方面,以往在制度变革中居于被动地位的大学和学者团体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既有依据又有动力作为新一轮制度变革的主体,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进行制度创新。

(一) 克服“路径依赖”,采取渐进式的变革策略

诺斯指出“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就会增强这一进程。”^[13]换言之,这种在制度创新与变革中会随着报酬递增而出现的自强机制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出现意味着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原来的正确路线进入制度变革的良性循环中;另一种是顺着原本错误的路线,并不断深入发展,结果必然是深陷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我国目前的学术评价制度由于量化评价占据垄断地位,并且愈来愈暴露出其危害学术活动、破坏学术生态和违背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弊端,改革势在必行。但在目前行政权力掌控大学的背景下,受技术至上主义、管理的方便快捷和形式的客观公正等优势的影响,学术评价的量化考核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具有某种不可或缺性。同时,以学术共同体为基础的同行评议机制因其固有的缺陷与不足又似乎难以支撑大局。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创新与变革,难免会因为无法预计潜在的利益而

出现动力不足,或即使出现制度变革也有很大可能产生路径依赖现象。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提高对现有制度的认知水平,了解其长处与短处,另一方面应考虑和尊重制度变革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尽可能地克服路径依赖的负面影响,寻找和创设制度创新与变革的动力机制,尽量采取渐进式的变革策略,降低改革风险,减少因短时的信息不充分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

(二) 扬长避短,适当强化诱致性变迁模式

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执行上具有强制性、高效性的优点,但过于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来众多负面效应,如出现“寻租”“设租”以及与现实需要的偏离现象等。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尽管也存在诱致性的变迁,但地位非常薄弱,强制性的变迁模式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况且,就以自主和自由为特性的学术评价而言,更需要各大学自发地进行符合现实需要的制度安排。由于学术的高深性、专业性和学术组织较政府更直接地规约学术人等特性,在学术评价制度创新方面,选择诱致性变迁模式比强制性变迁模式更具有现实性和高效性。事实上,“诱致性制度变迁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完成后期任务,强制性制度变迁也需要诱致性制度变迁来进行前期探索、积累经验。”^[14]可以说,任何一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这两种制度演进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在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嬗变过程中,两种制度变迁模式各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鉴于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制度变迁的特征,打破强制性变迁的主导地位,适当强化各大学和学术团体自发的诱致性变迁,的确是当务之急。

(三) 发展健康的学术生态,提供良性制度创新环境

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是“真空”状态下的独立存在,它必定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和运行的。学术制度一方面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作为“指挥棒”的学术评价制度也不例外。在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创新与变革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制度环境对制度创新所产生的约束性条件。而良性的制度环境与学术生态的健康是一致的。

笔者以为,当前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创新要充分考虑政治和传统文化的因素。具体而言,应努力解决好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和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只有大学与大学学术具备了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才能不断消除外界对学术的过度干预,保证学术的专业性,使其能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创造性活动;二是协调好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努力提

高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裁决学术和评价学术活动的应有的地位;三是加强制度的绝对供给和有效供给,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充实学术评价内容,特别是应在评价程序、指标及其权重等方面加强建设,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公正性、合理性。如此,才能进一步摆脱学术评价中的人情关系网络,防止因“熟人社会”或“裙带关系”而使学术评价活动发生偏差。

总之,大学、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建设和发展健康的学术生态,营造良性制度创新的环境。只有这样,大学学术评价制度创新与变革才能减少阻力、有效进行。

参考文献:

- [1][6]刘明.学术评价制度批判[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6,119.
- [2]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4:144.
- [3]陈琦.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理论辨析[J].煤炭经济研究 2004(10):33-34.
- [4]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A].现代制度经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255.
- [5]李文涛,苏琳.制度创新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纵横 2001(11):61-63.
- [7]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M].北京:三联书店 2001:44-45.
- [8]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183.
- [9]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M].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89.
- [10]康宁.转型期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J].复旦教育论坛 2004(6):44-47.
- [11]康宁.中国经济转型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102.
- [12]冯皓.道德自律与社会控制:规范学术活动的两种力量[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143-147.
- [13]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胡庄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302.
- [14]贺武华,高金岭.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解释[J].江苏高教 2004(6):27.